

[葡] 莫嘉度●著 [葡] 萨安东●编  
舒建平 菲德尔●译

# 从广州 透视战争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  
中日战争的报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从广州

透  
视  
战  
争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

[葡] 莫嘉度●著 [葡] 萨安东●编  
舒建平 菲德尔●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葡)莫嘉度著;(葡)萨安东编;舒建平,菲德尔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1

ISBN 7 - 80618 - 791 - X

I . 从... II . ①莫... ②萨... ③舒... ④菲... III . 抗日战争(1937 ~ 1945) - 史料 IV .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455 号

**Título Original**

A Guerra vista de Cantão

— Os relatórios de Vasco Martins Morgado, Cônsul - Geral de Portugal em Cantão, sobre a Guerra Sino - Japonesa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8

本书中文出版权由东方葡萄牙学会授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从广州透视战争**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

著者:[葡]莫嘉度

编者:[葡]萨安东

译者:舒建平 菲德尔

责任编辑:方小芬

装帧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53060606 邮编 20002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社科院印刷厂

开 本:890 × 1240 1/32

印 张:9.5

插 页:4

字 数:192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500

---

ISBN 7 - 80618 - 791 - X/K·357 定价:32.00 元

---

## 中文版序言

在葡萄牙外交部的外交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着一批曾任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的莫嘉度（Vasco Martins Morgado）撰写于1938年2月至1939年5月的报告。这些报告记载的情况，或出自莫嘉度的亲眼目睹，或得自葡萄牙领事馆成员等可靠的渠道。对于并非目击的信息，他还作过严格的筛选，只有他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内容，才会写入报告。因此，这批由驻外官员向本国外交部的报告，在当时无疑是秘密报告，确实相当真实可信。正因为如此，东方葡萄牙学会于1998年出版了这批经葡萄牙知名学者萨安东博士编纂、整理的报告。有关这批史料多方面的价值，萨安东博士已在原版序言中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本文已无重复的必要。而中国的读者会特别关注的，则是报告中披露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

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到今日，已有半个多世纪。然而，始终有一批日本人蓄意抹杀无数血写的事实，否认日军在南京进行过大屠杀，否认日军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犯下了战争罪行。与此同时，由中立国人士，与日本同盟的德国的正直人士，以及原来的日军士兵所提供的各种确凿可靠的史料，一次又一次地揭穿了

他们的谎言。莫嘉度的报告也就是一根将日本侵略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不锈钢钉。由于葡萄牙在中日战争中直至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中立国，葡萄牙政府对正在激战的中日两国又确定了“严格的等距政策”，莫嘉度本来是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冷眼旁观这场战争。不过，事实清清楚楚地显示哪一方是邪恶的侵略者，哪一方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师，因此，莫嘉度如实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成了指控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证词。

翻阅莫嘉度的报告，耳旁便不时响起日本飞机俯冲时的呼啸和炸弹爆炸的巨响，眼前不时闪现被大火吞噬的城镇，遍地的断壁残垣与遇害的老弱妇孺。这些报告以铁一般的事实在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国际公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中国民众的野蛮屠杀。

在莫嘉度开始撰写这些报告时，日本飞机已对广州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持续的狂轰滥炸。它们不仅仅轰炸军事目标，而且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掷炸弹、燃烧弹，并用机枪射杀居民。目击了这种惨况的莫嘉度写道：“日本飞机每天都进行猛烈的攻击，现在的范围更广，造成的破坏更大，形式更野蛮，因为日本人用燃烧弹进行轰炸。在过去的几天中，市区，完全是市中心，成为日本人的目标。那些飞机不只是攻击大部分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群，还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街道，然后如同屠夫般的，在较低的高度扔下燃烧弹。成千人受伤，数百人丧命，数百间房屋被摧毁”。<sup>①</sup>莫嘉度还多次强调，日本飞机轰炸市中心，并非偶然的误炸，而是蓄意要在

中国居民中制造混乱、死亡和恐怖：“日本人把市中心作为主要目标，而且好像是唯一的目标”，在这些攻击中，“伤亡最多的是妇女、儿童、和平的居民和劳动者”。<sup>②</sup>这种野蛮的轰炸并不限于广州一带，在整个华南地区，日本人都在进行这样的空袭，“杀戮、毁灭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sup>③</sup>与此同时，日本飞机还轰炸往来于珠江口的中国客轮，攻击中国的民航客机，使大批乘客患难。这帮空中强盗确实是做尽了它们所能做的一切坏事。

莫嘉度的报告又表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员都确信日军在南京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并在他们攻陷的其他地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1938年3月，日军侵占了位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莫嘉度获悉，日本海军、陆军士兵对这些岛屿上的“妇女、儿童所采取的行动，是南京事件的翻版”。<sup>④</sup>不久，在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游击队歼灭了一批日军海军官兵。几小时后，日本战舰就炮轰该岛，摧毁了岛上所有的建筑，杀死了岛上的所有居民。于是，附近岛屿的居民只得逃往澳门、香港，以躲避日军的屠杀。同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葡萄牙驻厦门领事馆的官员即向莫嘉度报告，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的大屠杀十分残酷”。<sup>⑤</sup>其他的外国人也证实，在厦门，对于“那些战斗到最后还没有阵亡的士兵，日本人将他们排成队，用机枪扫射”。由于在华的外国人士“对日本人杀人如麻的本性已习以为常，所以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sup>⑥</sup>到日军侵占广州后，中日两军在广州附近地区形成拉锯态势。莫嘉度又屡次指出，在此期间“日本人每占领或重新夺回一个地方，接下去就是烧杀掳掠”。<sup>⑦</sup>可

见,除了制造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军在他们铁蹄践踏过的地方还进行过无数次大屠杀。

日本侵略军不仅残杀中国民众,还肆意轰炸在华的中立国居民建立的学校、医院、教堂等设施。据莫嘉度的记载,在1938年6月的半个月中,法、美、英三国驻广州的领事官员便分别向日本提出了抗议。法国领事抗议日本飞机轰炸法国人在当地开设的多梅尔医院。日本飞机的轰炸使这座医院损失惨重,法国医生被炸伤,一批在院内治病的病人及避难的人们被炸死。美国领事抗议日本飞机轰炸美国人开设的岭南大学。日本飞机在那里投下三颗炸弹,一些妇女被炸伤,校舍被毁,学校只得遣返全部学生。英国领事则抗议日本飞机不断飞越位于沙面的英租界,并在广州进行造成了成千上万人伤亡的野蛮轰炸。<sup>⑧</sup>此后,日本飞机又轰炸了当地一座美国人开设的医院和一座法国人建造的天主教堂。这座被部份摧毁的天主教堂是一个儿童的避难所,大约有200人罹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和妇女。莫嘉度还认为,轰炸中立国侨民开设的医院、学校等机构,似乎是日本人蓄意的行为。在日军对某一地点发动攻击前,他们总是通知当地的中立国侨民在房屋上涂上本国国旗的颜色,然而恰恰是日本人就会随即破坏这些房屋。例如,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曾多次指出在肇庆的葡萄牙传教团的位置,但随后日本飞机便摧毁了这些传教团。莫嘉度便得出了这样的“初步感觉”:“日本人询问我们的房屋在何处,为的是以后对其进行袭击。”<sup>⑨</sup>这一“初步感觉”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日本侵略者从来不遵守国际

公法则是不争的事实。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在此后的报告中，莫嘉度除了继续记录日军残杀中国民众的暴行，更多地记载了日本人对中国南方经济重镇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掠夺。

首先对富庶的广州城实施大规模抢劫的，是日本军队。莫嘉度在其报告中写道，在日军入城的最初几天中，日本士兵忙于截获他们所见到的和得知所在的大米与燃油，其中大米是他们从政府和私人的仓库中掠夺的。随后，他们扣下所发现的一切公私财物。他们掏走遇见的中国居民口袋中所有的现钞，以及戒指等值钱的财物；他们将找到的铁丝、工具、器皿等都集中到一个地点，在另一处则集中存放抢来的大米、面粉、燃油等。对于掳掠来的汽车，他们毋需办理什么手续，只要涂成黄色，即成了日军所有。<sup>⑩</sup>中国的民船也大量地被日军强占。日军从广州运出的物资，都是他们从城内被人抛弃或者撬开的仓库里抢来的。对于无法抢走的物品，他们便大肆毁坏。日本军队的掠夺、破坏，是广州城遭到的第一轮洗劫。

此后，尾随侵略军人城的浪人、奸商等形式式的“日本臣民”也加入了对广州的掠夺。莫嘉度在其报告中描述了这些日本人如何强占中国居民的财产：日本人将酒店、商店、发屋、市场等“所能见到的一切都为所用，他们进去后就安顿下来，在门上插一面日本旗，这样，这些地方就自动地变成了日本人的财产，不会有人大肆毁坏。有些日本人还在没有投入任何资本的

情况下开设了一家“中日合资”的公共汽车公司，即他们将当地公共汽车公司留下的几辆汽车占为已有，在清洗一番后就用它们上街营业。对此，莫嘉度讽刺地写道：“日本人所到之处，以这种不用资金建立公司的方法尽人皆知。这样，就没有发放股票和寻找股东的困难”。<sup>⑫</sup>莫嘉度又指出，日本人对中国居民的财产的掠夺，是得到日本官方的授意和鼓励的。在日军侵占广州后不久，所谓的“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就发布通告，宣称“为提防破坏分子的活动”，并加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合作，他已“授意日本臣民”可在当地的若干繁华街区中“任意选择合适的空房，暂住在那里，替其主人看管房产”。如果这些日本人将房屋用于经商，该总领事将收取适量的租金，在房主回来后交付给他。<sup>⑬</sup>当然，中国民众不会幼稚到分不清日本人的所谓“看管房产”即系强占，更不会指望这些强盗会支付租金。

到 1939 年 5 月，日军占领广州已有半年以上，他们公然抢劫、强占中国民众财产的行动似乎已稍有收敛。在事实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居民的经济掠夺丝毫也没有放松，其主要方式即是强行流通所谓的“军票”。为了转嫁浩大的军事开支，日本政府大量地印刷“军票”。对于“军票”，莫嘉度作了如下的记述：日本士兵“作为薪水接受的是一种政府称之为军票的纸片。它被强制流通，不仅仅是因为它被称为钱，而且还由于以下这一情况：不管是谁，都必须接受这一纸片，因为士兵除了这一发给的纸片，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支付。即使卖主不愿接受这一纸片，也保不住他的货物。谁要是接受了这种

钱，拿到银行去，即使是日本银行也不接受，也不予兑换成任何一种等值的外国货币。这样，一些商人手里拿着大量的纸片，却失去了大量的货物。日本商人也有同样的遭遇。由于日本士兵是在中国，被敲诈的就是中国人。估计这一段时间，这些纸片将类似所谓的‘德国纸钱’即马克，可以用来糊房子。”<sup>⑭</sup>可见，参与对中国的沦陷区直至被日军侵占的东南亚所有地区经济掠夺的，还有日本政府。

在进行侵略中国直至侵略东南亚的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一直信口雌黄，掩盖事实的真相，否认他们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否认他们企图奴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罪恶目标。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连篇谎话，莫嘉度的报告也作了一定的揭露。

莫嘉度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历任首相和军事将领一直反复宣称，“日本发动这一战争除了想建立亚洲新秩序并避免共产主义的泛滥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不想也永远不会进行领土扩张。但他们所做的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否定了这些话，使其巨大的野心暴露无遗。”<sup>⑮</sup>在回顾芦沟桥事变后大约 600 个日日夜夜的变化之际，莫嘉度又指出，日本人一直声称“从中国这里开始重新建立亚洲新秩序。一点不假，确实带来了一种新的状况！一种混乱，反常，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称其为乌烟瘴气”；没有比日本占领这“更糟糕、更一无是处、更令人难受、更灾难性的”情况。<sup>⑯</sup>可见，即便是中立国的外交官也完全不相信日本人所谓的“共存共荣”一类的谎言，并在给其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对这些谎言作了充分的揭露。

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谎言不仅仅用于欺骗被他们占领区域的民众,以及中立国的人士,也是用于欺骗本国的士兵和民众,使他们不了解这场战争的真相。莫嘉度在其报告中揭露道:“日本的另一个重要依托,是在国内外进行的有组织的宣传,用以否认显而易见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实。这一宣传拥有一个受制于军队和听从军队的政府的新闻组织,它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支持战争,压制抗议。”<sup>⑦</sup>日本政府和军部极力欺骗本国的士兵和民众,主要是因为经过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军士兵死伤惨重,如果不隐瞒战争的真相,它们就无法继续这场侵略战争:“日本军队已显示出纪律松弛、傲慢自大,不论从道德角度,还是精神上都缺乏士气。他们不理解战争,只是服从。他们勉强进行这场连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征服战争。大量的死亡使其士气受到打击。只有不让日本国内知道这场战争已夺走了大量生命,才能使日本政府避免席卷整个帝国的不满上升”。<sup>⑧</sup>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仍有那么一批人仍在散布谎言,欺骗日本民众。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势必会给日本人民再次带来莫大的灾祸。

莫嘉度的报告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内容。此外,报告中有关远东国际关系以及澳门情况等多方面的资料,也可供诸如研究中外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澳门历史的学者们参考、利用。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莫嘉度对于中国的某些情况尚未完全了解,因而他的报告也有若干差错。例如,他认为在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地对共产党进行有步骤的围剿”;

认为陈立夫当过孙中山的秘书等。这些差错多出现于他出任广州总领事前的历史事件,而他对1934年后亲历的情形的记述,则很少出现错误。此外,限于他当时的地位和接触面,他对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赞许,对共产党的评价,也难免有失实之处,对此,也请读者予以注意。还应提及的是,在报告原文中都一一列出了近期受日本飞机轰炸地区的地名。由于这些地名都用葡文拼写,如今大多已无法复原成中文。为了避免误译,在出版中文版时只得略去这些具体的地名,好在这种省略尚不至于会对理解译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莫嘉度报告中文版的出版,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葡文原版出版者东方葡萄牙学会以及报告的编纂者萨安东博士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无偿转让了中文版版权。澳门基金会管理委员吴志良博士等提供了不少协助。将葡文译成中文的舒建平、菲德尔先生对译文作了多次认真的校订。许洪新先生则按中国内地的出版要求对译文作了一些整理。可见,这一报告的中文版,是中葡两国学者进行国际合作的成果。作为这一中译本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希望其他的中国读者也能充分认识这一译作的价值,并从中获得众多的启迪。

费成康

2000年9月18日于上海

---

注:

①本书第36页。

②本书第37页。

- ③本书第 138 页。
- ④本书第 21 页。
- ⑤本书第 48 页。
- ⑥本书第 45 页。
- ⑦本书第 231 页。
- ⑧本书第 65 页。
- ⑨本书第 229 页。
- ⑩本书第 207 页。
- ⑪本书第 222 页。
- ⑫本书第 222 页。
- ⑬本书第 209 页。
- ⑭本书第 266 页。
- ⑮本书第 239 页。
- ⑯本书第 249 页。
- ⑰本书第 147 页。
- ⑱本书第 147 页。

## 葡文版序言

### 一、介 绍

现出版的由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写于 1938 年 2 月至 1939 年 5 月期间的报告，庋藏于里斯本外交部外交 - 历史档案馆。<sup>①</sup> 确切地说，或许应该将其称作为政治报告。

莫嘉度生于 1888 年 9 月 5 日，卒于 1965 年 9 月 23 日。1911 年 3 月被派往巴西的桑托斯担任副领事，开始了外交生涯。1915 年至 1919 年，在阿亚蒙特首次出任领事。1919 年 7 月被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但因已履部长会议主席秘书并兼外交部长秘书之职，故未能赴任。

1920 年 3 月，莫嘉度出任驻比戈领事，直至 1927 年 3 月。其间，曾两度暂离此职。一次是 1922 年 1 月至 2 月因担任外交部长秘书一职，另一次是 1924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因担任了巴伽民政长官。1927 年 3 月 29 日，即在同年 2 月 3 日和 7 日分别发生于波尔图和里斯本的革命运动数周后，转入待命状态，直至 1933 年 11 月 24 日

---

① 外交部外交 - 历史档案馆收藏号 3P·/A·9/M130。

被任命为驻广州总领事。他任此职至 1939 年 1 月 9 日转驻香港领事馆为止。

1939 年 6 月,英嘉度被任命为驻德班领事,1950 年 7 月担任国务秘书,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职位。在此期间,莫嘉度还在拉巴特(1941 年 9 月)和汉堡(1948 年 4 月)履行过领事之职,并承担过一些重要使命,如 1943 年 5 月前往法国戴高乐和吉奥特政府所辖的阿尔及尔,以及作为特使前往德国以促进重新在该国设立领事之举。此外,他还于 1949 年 5 月作为葡萄牙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一个葡德商贸合同的谈判。

现发表的文献属于通常葡萄牙驻外外交代表机构向外交部提供的报告这一类文件,因此具有官方文件性质。这一官方文献,鉴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所论述问题的性质,尤其是因为它所描写内容的严酷性、事态的戏剧性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完全有必要将其列入“东方追忆”丛书付印。

遵循以前出版卡尔维特·德·马加良斯大使的《战后澳门与中国》一书时所确定的方针,对东方葡萄牙学会及时进行这一带有创新思想的出版活动,我们不能不予以赞扬。首先,是这些资料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价值,这不仅是对葡萄牙的远东外交史研究所体现的价值,而且是葡萄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贡献;其次,是出版从未发表过的外交文献,这在葡萄牙是不多见的做法。不容置疑,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保存这些报告的外交部外交 - 历史档案馆始终给予的有益和高效的合作,为这一出版工作提供了便利。

下面几页文字的简单目的在于引导阅读这些资料的读者，便于他们的理解。为此，略作提示，供读者参考。我们将其分为三个主要方面：至 1939 年 10 月日军攻占广州这一作为这些报告高潮为止的中日战争的一个概貌；针对这一问题葡萄牙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由于澳门处于一个重要军事行动舞台的位置，所以葡萄牙对其尤为敏感；最后是这位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的独特眼光，他有义务向里斯本报告发生在他身边的事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 二、中日战争、葡萄牙、澳门与广州的失陷

莫嘉度总领事在报告中所叙述的内容单纯而简要，那就是中日战争。在现代编年史中，尽管这一战争所持续的时间更长，却通常被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所掩盖。然而，这是一场无任何先例可循而且极为野蛮的战争。就像约翰·坎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一书中所述，“不管我们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诸如地理广度或是军事和经济调动的规模，双方军事和非军事人员的伤亡人数，对人民生活的破坏或是给世界经济所造成的混乱等等，受 1937 ~ 1945 年的这场战争危害的人数，比起以前或从那时起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多得多，危害也更直接”。

1937 年 7 月至 1941 年 12 月，是中国单独与日本较量的 53 个月。若非如此，完全有可能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仅据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些历史学家将导致世

界旧秩序改变和新秩序建立的政治因素，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追溯到 1937 年的亚洲而不是 1939 年的欧洲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这尽管会引起异议，但并不能消除 1500 万～2000 万人被夺去生命，一个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业被毁灭，以及加重一场已见端倪的农业危机这一事实。

我们且不说那几年中在社会及文化方面所产生的深刻的，可以察觉到的变革（一些作者将其总结为人口的内容或国际流动），我们应该考虑到外国占领的残酷经历，抵抗活动的组织及与敌人合作的中止。此外，还应考虑到一些附带，但并非不重要的效应，如妇女劳动力的动员及战争科技的发展。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中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整个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只需考虑一下它所产生的一些最重要影响，如在取得胜利的蒋介石政权遭到消耗的基础上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以及日本从军国主义过渡为自由体系和富强的阶段。只需注意一下，尽管这些并不是日本的直接目的，但无法否认这是日本军事扩张主义，以及在美国的攻势面前它的撤退所留下的巨大真空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它们成为形成当今国际秩序的催化剂，更毋需说非殖民化进程的爆发。

这一被认为正式肇始于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的战争，应该将其结合在日本这一岛国对外扩张过程的后期历史来加以理解，即受政治、地理、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汇聚在一起的复杂局面所驱使，这一扩